

← (上接12版)

伯希和一行到境后,“卑职接谈时见伯希和温文尔雅的,是绩学之士”[《近代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史料》中文史料:(七)伯希和,第259页]。近一年后的1907年9月19日,时任轮台县知县的荫锡,在《为报伯希和等人入出轮台县日期及境内活动情形事给荣霈的申文》中,同样提及伯希和“抵轮,阜县晤谈,该文学士伯希和为人品方正,词藻谦和,询系侨寓京师有年,淹通中国语言文字,博览好古,诚非虚誉。当询阜县境内有无古迹以及矿苗。”(同上,第262页)

而甫抵喀什,作为沙畹高足的伯希和便在一个外交场合与《刘平国刻石》不期而遇,并一眼便认出这正是他老师曾完成课题研究的拓本。9月14日,在致1882年起便当选法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院士,担任法国亚洲委员会主席一职近30年,同时也是1902年在德国汉堡召开新一届东方学家代表大会上成立“西域和远东历史、考古、语言与民族国际考察委员会”的法国委员会主席、法国著名东方学家埃米尔·色纳尔[耿昇《伯希和西域敦煌探险与法国的敦煌学研究》(代序),《法国敦煌学精粹》1,第3.4页]信中,伯希和曾不无得意和兴奋地描绘了这一奇遇:

最后是刘平国作亭诵石刻的拓片,其中有一种拓片是由博安(一译作邦宁,即保宁)自乌鲁木齐携归,已经由沙畹发表。我是通过本处的汉人,而了解到治关亭诵的摩崖石刻的,它在这些人中的名气很大。该亭诵是在20多年之前,在拜城地界内发现的,它于今天仍被

保存在拜城本地。

而在次年1月29日致色纳尔信中,伯希和又颇为详尽地汇报了亲赴《刘平国刻石》所在地访碑推拓细节,其中包括即兴迸发的学术思维火花。

经过在库车停留一天后,我于21日离开,这次是向西走去。……从地理上讲,库车县就如同拜城县一样,至今仍是一片未知之地。黑英山也如同克孜尔一样,均属于拜城。……现在尚待于考察摩崖石刻了。有人告诉我说,数月之前,阿富汗领事(或领事馆工作人员)曾去制作拓本。然而,“阿富汗领事”也正是库车的印度“领事”。我在喀什看到了由他寄出的刘平国颂亭碑的拓片。一旦有人另外还告诉我,该碑还包括只有几个字的很小的一段独立部分,我便不持任何怀疑了。它由沙畹发表的那篇碑文,也是我们至今所知喀什地区最古老的碑文(被断代为公元157年)。1月23日,我经过在途中考察了一座煤矿之后,便来到了这片岩石上的石刻或摩崖石刻所在的地方,即位于一片非常不平坦的石壁上,也就是克孜勒苏自阿尔通霍什从大山中流出的地方。该地点颇有意义,因为它似乎说明,人们在汉代只利用了一条很不方便的道路。它经过克孜勒苏的这条河谷,一方面从喀什地区到伊犁,另一方面则要经由浴勒都斯河。这同一山口处,有一座阿古柏柏克的小堡垒,所处地点相当不理想。现在基本上没有任何人在那里生活了,我所遇到的仅有的几个生灵都是山鹑,其中有些出现得正当时,以改善我们的伙食。……我觉得某些古城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富有发掘前途。

伯希和是在结束对库车展开近乎地毯式考古发掘而一网

打尽后,才于1907年7月底到8月底历时约一月时间,跟“同伴们考察了位于库车以北的山脉”,从而有了跟《刘平国刻石》又一次零距离接触[(法)伯希和《喀什与图木舒克考古笔记》韩百诗案语,《法国西域史学精粹》1,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第74页]。

关于这个话题,伯希和探险队随行者之一、负责地理测绘和天文观察以及自然史方面项目的军医瓦博博士《中国西域地理考察报告》,可跟伯希和日记相互印证。

值得一提的是,伯希和关注《刘平国刻石》所在地史地旅行日记还不止一处,在8月11、18、23、31日记中,他留下连续好几天好几段结合《刘平国刻石》文字涉及周遍自然条件、环境的实地考察分析,此举显然跟他导师沙畹此前问世包括对《刘平国刻石》研究的《中亚古碑考》对他的影响有关,也可以说他是因此而有意地专程身临其境的。8月31日,他在库车致色纳尔信中指出:

此外,正是在一条自克孜勒苏河通向科克苏河之间道路的南口,我在数月前发现了刘平国作亭颂,它是当地最古老的石刻;我同时还发现了巴里坤碑(指哈密巴里坤东汉《任尚碑》、《沙南侯获碑》和《裴岑纪功碑》),沙畹过去曾根据博安(即邦宁)的一幅拓片而发表过这通碑的碑文。……我于此时才获悉,那里共有10条路,其一在东部,与我们刚刚逆流而上的那条激流相对应;另一条在西部,它就是我发现刘平国作亭诵的那条路。我在近十天来所走的正是这两条路。……克孜勒苏东部之路,被称“阿勒通霍什”(黄金之路),它始终都会制造相当严重

的困难。至于柏孜克里克之路,也就是刘平国打通的那条路。但我怀疑他从未曾“凿空”大山以使其骑兵翻越而过。然而,其18世纪的继承人似乎曾经经过那里。正如他讲的那里,在两日里一直手牵着其马,于风雪交加中行进,我甚至没有掌握其报告的全文,但这并不妨碍我对该问题的决断。如果这位将军骑马爬上了喀喇达坂(黑色达坂)和阿克达坂(白色达坂),那真是一次了不起的壮举。[(法)伯希和《伯希和西域探险日记》附《伯希和西域考古探险书信选》,第680-682页]

另需指出的是,伯希和1907年元月和8月两次对《刘平国刻石》的访碑活动,几乎都未予以推拓,而是分别事后由地方官府向他提供拓本,就此,有巴黎吉美博物馆藏伯希和档案所见阿克苏道台潘震致伯希和函为凭。

希尼星使大人阁下,两次晤教,闻所未闻。……所谈乌垒碑,适检行篋尚有存者。兹送上大小拓各十张,以为大君子稽古之助;兼以作他日相逢之券。尚希鉴存为幸。肃请台安。潘震顿首。(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藏伯希和档案所见清阿克苏道台潘震致伯希和信笺)

而据《伯希和西域探险日记》载:“今天有人为我带来了阿克苏道台的一封信,其中包括对刘平国作亭诵的释读文。”这天估计在1907年5月20日的库车。另据1908年2月8日记:安西州知州恩光裕如也曾给伯希和送过一份《刘平国刻石》拓本。这一行为方式似乎成为当年新疆地方官吏礼遇远方贵客的惯例;除上述潘震两送拓本给田野强和伯希和,以及恩光赠送伯希和外,在野村荣

三郎《蒙古、新疆之行》的《逗留于乌鲁木齐》中,他也提到1910年11月1日,他们应“布政使王方伯(王树楠)的好意,将布政使衙门的一间房子借给了我们,我们就搬到了那儿去了”后,“5点回到寓所,王布政使回访,送给我们一幅巴里坤汉唐石碑的拓本”[(日)野村荣三郎《蒙古、新疆之行》,载(日)大谷光瑞等著《丝路探险记》,第149页]。

总之,伯希和是继保宁、沙畹后第三位跟《刘平国刻石》关系密不可分的晚清之际法国汉学家,而且是唯一在西域旅行过程中深入摩崖所在地作调查的法国汉学家,他有关周边道路交通、环境描述,跟乃师沙畹对《刘平国刻石》考释,可谓珠联璧合,基本对该石刻进行了全方位立体式梳理盘点。而就这样一位自学成才,对西域学具有天才般无所不通学识的汉学家而言,伯希和当初竟不足而立之年[(法)伯希和《库车地区考古笔记》1907年5月28日记:“今天,我度过自己的29岁生日,我们已完成了都勒都尔-阿乎尔的发掘。……”,《法国西域史学精粹》1,第138页],此等年龄有如此才学,简直不可思议。而就保宁、沙畹、伯希和的《刘平国刻石》研究方法论来说,“法国考古探险团远涉西域时,虽然那里的几大重点考古发掘地点(喀什、库车、吐鲁番、敦煌、于阕)均被其他国家的同行们捷足先登了,但非常注重人文精神的法国仍出奇招……”[《伯希和西域敦煌探险与法国的敦煌学研究》(代序),第3页]而伯希和确是其中翘楚。

(作者为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

顾千里校本《元朝秘史》札记

关于日本的那珂通世译本

李庆

1807年,日本那珂通世的《成吉思汗实录》出版,这是日本蒙古研究史上的划期之作。该书的写作过程,作者《序论》已经做了说明(见筑摩书房,1943)。关于那珂研究翻译《元朝秘史》的情况,笔者曾有所介绍(见三宅米吉《文学博士那珂通世君传》,载《那珂通世遗书》。见拙著《日本汉学史》第一卷,又拙编《东瀛遗墨》10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那珂是根据文廷式所赠,从盛昱处抄录本翻译注释的。因为盛昱所藏为顾千里校本,近年多有学者指出,说那珂是根据顾千里校本翻译,这样说大体无误,但是有些情况,还应说明。

其一,那珂研究元代历史,翻译《成吉思汗实录》,内藤湖南在1907年(日本明治四十年)《那珂博士的成吉思汗实录》一文有说

明(见内藤湖南《全集》十二卷,158-160页,日本,筑摩书房,1997)。但是,说那珂收到了内藤湖南所赠的“顾千里校本”的书以后,才开始研究、翻译,则不太确切。

早在此前,那珂就关注元代研究和蒙古等西域研究了。在此前,他已经有《元史译文补正》(1902)之作。他关心西域,关心元史,乃受到当时中国国内西域研究之风的影响。经历了1840年的动荡,中国越来越多的学者把眼光投向了世界,包括西北、东北、蒙古等地区。在这样的背景下,所谓“西北交通史”成了研究的热点,出现了洪钧的《元史译文证

补》,李元度的《元朝秘史考》等著作。日本学界甚为关注。《元朝秘史》,自然也包括在内。1902年,到日本考察教育的陈毅,就和那珂、内藤等谈及蒙古和成吉思汗等研究情况(见陈毅给那珂通世的信,载拙编《东瀛遗墨》111页)。所以,那珂的研究和翻译,并非偶然,是当时包括中国、日本以及俄国关注东北,关注满蒙事务大背景的产物。

其二,那珂想要翻译《元朝秘史》(后改名《实录》),实际受到俄国巴拉第和博兹耐夫(就是卡法洛夫和波兹德涅耶夫)著作的刺激。当时,俄国和日本都在窥视我国东北乃至蒙古,此乃当时两国的基

本国策。虽说日本学者还没有见到俄国文本,但已经得知此事。这对于他们的冲击是显然的(见内藤湖南《那珂博士的成吉思汗实录》,载《全集》十二卷158-160),所以才和文廷式谈话中提到《元朝秘史》抄本(见文廷式给内藤的信,载《东瀛遗墨》110页)。

其三,文廷式给那珂的信息是不完整的。笔者在《日本汉学史》中说,文廷式是被派往日本的,乃未细核文氏行迹,不确,当订正。实际上,他是逃亡到日本的。他1900年回国,如约,把自己的抄本《元朝秘史》寄给内藤。当时文廷式并不清楚、自己的抄本是顾千里校本。所以,他给那珂的

信中,未提及顾千里本,而说是钱大昕和张穆的文本(见《文廷式给内藤湖南的信》)。不仅文廷式,内藤也是如此。内藤湖南在《蒙文元朝秘史》一文中,虽然全文录了顾千里的《元朝秘史题跋》,却说:“不知何人所撰。”(《内藤湖南全集》十二卷,151页)。可见他并不清楚顾千里校本。

那珂通世编撰了《成吉思汗实录》,还想用1908年叶德辉本为底本的蒙古字还原计划,未果。此后,内藤又收有了叶德辉的文本(见《内藤湖南全集》12卷505页),认为此书从“原刻本出”,显然有误。可见他们都没有特别关注到自己手边的文本和顾千里校本的关系。“顾千里校本”,是后来才被学界认识到的。(作者为日本国立金泽大学名誉教授)